

以心观政：特朗普对华政策的 国际政治心理学分析

蔡翠红 于大皓

[摘要]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与突变性特征。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视角构建“认知—情绪—决策”链条模型,可揭示领导人心理机制在政策生成中的关键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偏好源于其独特的认知结构,在国内外压力持续累积的情境下,既有认知偏差被情绪化反应进一步驱动,并在行政体系的决策流程中获得强化,最终外化为贸易战、科技战等高烈度、高风险政策。这一链条表明,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激进化并非仅源于结构性竞争,也是在领导人心理机制深度介入下形成的合力。理解特朗普对华认知与情绪的轨迹,是洞察当代美国政治心理裂隙的重要入口,而把握这一心理机制如何被转译为国家政策,则是研判中美未来如何走向理性竞争、有效管控危机乃至重建合作的关键。

[关键词] 国际政治心理学;特朗普对华政策;政策心理链条;贸易战;科技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6.03.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6)03-0064-(18)

[收稿日期] 2025-11-21

[作者简介] 蔡翠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于大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首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思维迅速由“接触—合作”模式滑向“竞争—对抗”轨道。无论是贸易战的骤然升级、科技战的全面封锁,还是舆论战的持续放大,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行动均呈现出显著的非理性与突变性特征。其重返白宫后,这一政策风格得以延续,在门罗主义基调的基础上将美国对华战略进一步从“战略模糊”推向“有限清晰”。^[1]为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如此激进?本文拟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视角切入,深入分析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心理逻辑,重点关注领导人认知结构、情绪反应及其在决策过程中的放大机制,并结合贸易战与科技战两个关键案例,揭示领导人心理机制在塑造当代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 理论回顾

国际关系研究正经历“心理学回归”，领导人认知、情绪与行为偏差等心理变量日益成为解释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路径。^[2]国际政治心理学强调，国家并非抽象的“理性行为体”，而是通过具体领导人的认知结构和情绪机制来感知外部世界并做出选择。领导人的心理特征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制度制衡相对有限或国际局势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对外交政策走向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围绕领导人决策行为，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出多条重要理论谱系，这些理论为理解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中的非传统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不同理论对领导人心理机制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核心关注点可以形成一个整合性理论链条。

其一，领导人个性理论解释如何塑造信息处理方式。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在1980年代系统构建了领导人个性分类框架，强调个性特质通过影响领导人的信息处理方式、政治目标排序、威胁感知结构等路径，塑造其外交政策行为。^[3]在此框架下，可以看到特朗普呈现出“反建制型”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典型特征，即高自信水平，强化其对外政策中的个人化与情绪化倾向；高支配信念，使其偏好零和式谈判与强制性施压手段；极低群体相容度，倾向于将复杂国际问题简化为“敌友”“输赢”的二元结构。这些特质为其对华政策中的强硬、冲动与高度个人化决策奠定了心理基础。

其二，认知图式理论阐明如何筛选与固化威胁解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强调，决策者依赖“图式”(schema)对外界信息进行归类与解释，这一认知机制虽可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却高度依赖既有印象与预设框架。一旦某国被置于“威胁者”的图式中，其后续行为无论模棱两可还是中性友好，均容易被解释为敌意信号。^[4]杰维斯关于“信号—噪声”与“意图误判”的分析，为解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后，迅速在贸易、科技、产业链、舆论等领域全面升级施压，提供了直观的认知机制解释。

其三，前景理论讨论如何放大对风险的主观体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的前景理论挑战了传统“理性人”假设，指出决策者在面对损失时更倾向于采取冒险性策略，并受到若干启发式偏差系统性影响。^[5]其中，锚定效应造成特朗普早期形成的负面判断会长期支配其对中国的政策认知；确认偏差使其更倾向搜寻与其偏见一致的信息；可得性偏差则源于媒体放大的中国科技崛起等事件强化了特朗普的威胁感知。前景理论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在感知美国相对衰落的“损失框架”下，更容易采取冒险、极化，甚至带有自损成分的政策工具，如强硬关税、极限施压、禁令政治等。^[6]

其四，动机理论分析如何投射为外部敌意。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提出，领导人的政策行为常建立在“动机—感知错位”之上，即领导人内在心理动机会被投射到外部世界，引发对他国意图的夸大与敌意性解读。^[7]特朗普反复将中国塑造为所谓“规则破坏者”“占便宜者”，这种叙事不仅服务于其国内政治动机，也反映出其内在焦虑结构。在国内政治压力、合法性争议频发的情境下，中国成为其填补心理防御需求的“外部替代对象”。

其五，社会认同理论则揭示如何将这种心理结构嵌入政治叙事与集体动员之中。亨利·

泰弗尔(Henri Tajfel)与约翰·特纳(John Turner)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在区分“内群体—外群体”时会通过增强内群体价值、贬低外群体来实现心理归属。^[8]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构成高度排他的内群体叙事,而“中国威胁”被政治建构为外群体的制度性对手,外部敌人形象的强化有助于动员选民、凝聚政治基础。

(二)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显著变迁。^[9]近年来关于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研究逐渐形成两条主要分析路径,分别是强调结构条件的现实主义路径和强调身份话语的建构主义路径,此外,心理机制在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也已引起学界讨论。

其一,大量研究在现实主义框架下解释中美关系变化,强调力量平衡、权力转移和安全困境。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认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几乎难以避免。^[10]在此逻辑下,中美竞争被视为力量分布改变的自然结果。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长期主张中国复兴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战略牵制具有结构性和必然性。^[11]韦宗友指出,包括特朗普时期在内的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源于中国实力增长引发的中美国际地位变化。^[12]王浩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基于结构性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互动。^[13]这一研究路径强调物质力量与战略利益,对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走向具有强解释力,但其局限在于往往忽视了政策制定过程中领导人偏好、国内政治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

其二,此类研究聚焦认同、话语与社会建构过程。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等建构主义者指出,美国对华认知不仅源于力量结构,更深受文化叙事、意识形态偏好与政策话语的影响。^[14]中国被塑造为“威胁者”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美国内部政治力量竞争中的一种动员性建构。柯岚安(William Callahan)指出,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治话语、身份构建与情绪化叙事的共同塑造,而不仅是基于客观实力评估,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制度性偏见、媒体叙事与选举政治构成了“威胁话语生产链条”,在长期强化“中国威胁”的刻板印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视角下,美国对华认知演变体现为一种政治—话语实践,而非纯粹的战略判断。^[15]王联合和孟晓宇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源于两党围绕“中国叙事”的持续竞争,在主导叙事形成后通过内部比拼强硬度来维护叙事信誉,从而不断推动政策升级。^[16]严谨和邵静怡指出,美国学术界与战略研究圈精英关于中国角色的若干基本共识,逐渐上升为美国决策层对华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17]建构主义为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社会因素,但对于具体政策如何由特定领导人推动却关注不足。

其三,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高不确定性时期,学界对政治心理学视角的关注逐步增加。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等学者提出,领导人的情绪结构、个性特征与认知偏差是影响外交行为的重要微观变量,尤其在政策快速变化、制度制衡弱化或政策高度个人化的情境中更为关键。^[18]王一鸣和时殷弘指出,特朗普的自恋性人格深刻塑造了其对外政策偏好,使其决策既具高度集中与行动迅速的特点,也伴随认知盲区、团体思维与战略目的弱化等负面效应,从而使“特朗普主义”在国家战略叙事中

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化倾向。^[19]季乃礼和孙佳琪从信念体系角度对特朗普进行系统编码分析,为理解特朗普对华态度的摇摆性与政策的不连贯性提供了微观心理学解释。^[20]刘璐认为,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个人认知结构,并通过认知相符机制与历史类比机制固化,最终推动美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对华贸易政策。^[21]尹继武强调,特朗普二次执政时期的对外战略虽然在外表现出强烈的无序性与不可预测性,但其背后实则源于自恋性人格、声誉需求与策略性计算交织而成的一套“理性的非理性”战略心理结构,同时其个性化行为风格的影响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与社会共识的约束与匹配程度。^[22]尽管上述研究提供了结构与政策层面的重要洞察,但在中美关系研究中仍相对边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公众态度、战略文化心理或制度性偏见,对领导人心理结构的深入刻画相对有限,^[23]尤其是对于特朗普个人心理结构如何塑造成其对外认知偏差,并转化为对抗性政策行为的机制的研究存在不足。

综观已有文献,可以总结出两个显著不足,其一,较多偏重结构与制度因素。现有研究多将中美关系变化归因于力量差距、制度竞争、价值冲突与战略互动等宏观结构,较少触及领导人微观心理层面的系统性讨论。其二,缺乏“认知—情绪—决策”的完整机制分析。尽管已有研究提及特朗普的个性、情绪化言论或政策不确定性,但缺乏对其心理变量如何影响对华认知、如何在决策过程中被放大,并最终转化为具有制度影响力的对抗性政策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因此,在整体研究路径中,“领导人心理结构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认知并生成对抗性政策”成为尚未充分填补的重要理论空白。基于上述不足,本文以国际政治心理学为理论支点,尝试构建一个“认知—情绪—决策”的分析链条:认知层面,探讨特朗普既有图式与认知偏差如何塑造其对中国的初始判断;情绪层面,分析失控感、焦虑感等情绪变量如何影响其政策偏好;决策层面,揭示其个性特质如何通过美国制度结构被政治化并塑造成系统性的对华竞争政策。通过引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微观分析逻辑,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对领导人心理结构的忽视,为解释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剧烈转折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同时需要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在特朗普任内经历了战略定位的重大转折,这一方向性变化有深刻的结构性动因与影响,并使拜登政府延续了战略竞争定位,但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特朗普个人心理如何使这一政策转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非理性与突变性特征。

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心理形成机制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深刻断裂。与以往美国政府在制度框架、战略算计与官僚博弈基础上形成的政策逻辑不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总统本人认知结构和情绪机制的影响。国际政治心理学揭示,领导人在感知国际环境时往往并非以完全理性的方式做出判断,而是基于其心理结构、情绪状态、认同需求和信息环境构建一种“主观世界”。在这一主观世界中,他国的行为并不按客观逻辑显现,而是被过滤、重构甚至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24]特朗普对中国的敌意政策并非完全源自力量转移的客观存在,也非纯粹的国家利益考量,而是在“认知—情绪—决策”的内在心理链条中逐步生成的复杂产物。

(一)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认知起源

特朗普的对华认知构成始于其个体心理结构。在国际政治心理学中,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被视为理解外交政策的重要自变量。在特朗普身上,此类特质并非轻微倾向,而是高度显性并主导其政治风格的核心力量,构成其对外世界理解方式的“心理底盘”。

与许多传统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具有极强的“人格化政治”倾向。^[25]他的认知模式并不依赖制度程序或专业信息,而是以个人经验、直觉、感受和对关系网络的理解为主要判断依据。这种认知方式与美国传统主流外交政策共同体的制度理性决策路径存在激烈冲突,使其对中国的判断更容易脱离国际结构的逻辑,而陷入个性化决策的轨道。

1. 自恋性人格

自恋性人格是理解特朗普认知基础的首要入口。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恋性个体往往具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强烈的自我中心性;第二,对赞誉与关注的高度依赖;第三,对批评与质疑呈现夸张化敏感与敌意反应。^[26]

特朗普的政治行为与言论几乎与上述特征完全吻合。自恋结构不仅表现为“夸大的自我价值感”,更重要的是,它会显著塑造个体的威胁感知方式。自恋性领导人倾向于将世界划分为“赞扬者—反对者”或“朋友—敌人”这类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使其对外认知天然缺乏中间状态,不易接受复杂、多层次、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逻辑。

因此,中国在特朗普认知中难以被看作“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性国家,而更容易被归类为所谓“利用美国、针对美国、挑战美国”的威胁性他者。一旦进入这一范畴,认知偏差便会自我强化,使其几乎不可能在任期内重新修正。

2. 防御性归因

自恋性人格容易衍生防御性归因。当个体遇到失败或困难时,为维护脆弱的自尊,他们会倾向将责任指向外部敌人,而非自身或内部因素。^[27]

特朗普正是在这一心理机制下,通过“外部敌人”的概念解释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结构性困境。^[28]美国制造业衰落、基础设施滞后、收入分化、社会撕裂,这些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在特朗普的认知中往往被简单归因于“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中国操纵市场”“中国利用了美国的善意”。这种叙事与其心理结构完美契合,外部敌人既解释了美国衰落的原因,也提供了其政治动员的核心材料,还使其内心逻辑自洽。

因此,在特朗普的认知体系中,中国并非基于战略评估的对手,而是被人格结构塑造的情绪化对象,是其政治叙事中必须存在的“他者”。

3. 交易性思维

特朗普长期从事房地产交易,其思维逻辑具有高度“交易性”(transactional)。^[29]交易性思维有三项关键特征:其一,短期得失高于长期结构考量;其二,对利益的理解以对价关系为主,而非制度或规则;其三,偏好通过“施压—让步”式谈判达成结果。

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代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和多边化结构存在显著张力。当特朗普将国际关系理解为类似商业竞争时,他便无法理解国际制度本身的功能,即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公共产品、协调利益冲突。在他眼中,制度不是中性的治理机制,而是一种“是否为美国服务”或“是

否为自己服务”的政治工具。

基于此,国际制度的运行逻辑在他的认知中变得极为简单,若制度有利于美国,则可以存留;若制度不利于美国,则必须重新谈判。在这种认知下,中国在WTO、全球供应链与高科技产业中的优势被简化为“占美国便宜”,而非全球化结构内部的自然演化。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使其对中国几乎没有合作性预期。

4. 封闭性认知

高认知封闭需求个体(high need for closure)倾向于在复杂情境中迅速接受最先获得的因果解释,并将其固化为相对稳定的认知框架。^[30]特朗普具有极强的认知封闭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这种需求意味着,他偏好迅速做出判断,形成的判断极难被修正,对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延迟满足高度厌恶。对特朗普而言,“中国威胁”叙事正构成其早期形成的核心解释模式。一旦该模式被确立,其后续信息加工便呈现出明显的“框架吸收效应”,即新信息被主动纳入既有框架之中,而非促使框架本身发生调整。

在对华认知方面,这一过程表现为对不同类型信息的系统性再解释,如中国在经贸问题上作出让步则被视为“先前错误行为的佐证”;如中国加强参与国际制度则被理解为“通过规则强化其外部影响力的努力”;如中国推进科技发展则被界定为“提升战略竞争能力的举措”。

因此,中国的正常发展诉求并未在特朗普的认知体系中形成可供选用的解释路径。特朗普的对华判断呈现出典型的单一框架主导特征,即以固定叙事结构处理外部信息,并通过持续的认知吸收过程强化原有威胁预期,从而形成一种难以通过事实信息纠偏的稳定敌意认知模式。

5. 图式性依赖

领导人在面对海量信息时会建立“图式”,用以快速解释世界。图式具有“选择性吸收—排斥修正—强化偏差”的特点。

特朗普形成的“美国受害—中国受益”图式恰恰具有这种自我循环机制,图式使他忽视那些与敌意假设不符的证据;媒体环境和顾问系统进一步强化该图式;强硬政策又反过来验证“敌意假设”。这种循环使其对中国的敌意认知不但牢固,而且不断加深。

综上,特朗普对中国的认知基础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人格化、情绪化、零和化和封闭化。这意味着,他的对华认知不是由结构决定,而是由个人心理过滤;他对中国的“敌意定位”不是策略选择,而是心理需求;他无法真正理解复杂的中美关系,只能通过简化和对抗来处理;一旦形成敌意判断,就将沿着既定路径不断自我强化。这种高度人格化且难以修正的认知结构,构成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心理起点”和“长期路径依赖”,并成为推动其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根本动力。

(二)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情绪驱动

如果说特朗普的认知结构为其对华态度提供了基础框架,那么情绪机制则为其对华认知注入动力,使这一框架从静态认知转化为动态敌意。认知心理学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领导人对外政策行为并非仅由信息加工过程决定,而是深受其情绪状态、身份焦虑与政治动员需求的共同塑造。^[31]特朗普的对华情绪反应之所以高度强烈并呈现持久性,关键不在于

中国行为本身的威胁水平,而在于其主观情绪加工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机制,使中国在其政治心理中从“竞争性他者”逐步滑向“失控的他者”。这一心理演化轨迹,是理解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强度与对抗性的关键线索。

1. 中国复兴的“失控感”生成

中国复兴本身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结构性现象,但在特朗普的情绪加工体系中,这种崛起被转化为一种高度情绪化的“失控感”。当一个行为者感知外部环境变化速度超出其认知预期和控制阈值时,容易产生“自主性威胁”(autonomy threat)与“控制感破裂”(rupture of sense of control),并以敌意和恐惧作为应对方式。^[32]

在特朗普的心理结构中,“控制”是一个核心概念。无论在商业谈判还是政治治理中,他都强调个人意志对局面的主导权,并以自己“掌控局势”的能力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此,当中国和技术、产业和全球治理领域快速推进时,特朗普的反应不是将其视作国际结构演化的必然现象,而是将其情绪化理解为一种外部力量对其“控制权”的侵蚀。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崛起并不单纯构成战略威胁,而是直接触及其心理结构中的“控制需求”,促使其将中国定位为难以掌控且可能反制美国的外部行为体。

这种失控感不仅来自客观数据,也受到媒体叙事与政治话语的推动。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多层叙事中,中国的发展常常以跨越式、指数性和“颠覆性”方式呈现,使其被描绘为一个“增长过快而危险的力量”。特朗普身处的保守派媒体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提供了大量形象性、感性化的信息,使其情绪性判断不断获得输入,从而加深其对中国的负面情感。

2. 敌意建构的“威胁感”路径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国际政治中的“敌意他者”往往不是由对方行为直接决定,而是由主体的身份焦虑、情绪投射与叙事结构共同塑造。^[33]特朗普对中国的情绪加工过程正体现了这一理论逻辑,即中国的发展被解释为“针对美国”的行动,而非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结果。这一推断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化因果归因,而非基于事实的结构性分析。

这种情绪化路径具有三个层次的演化,第一层是从经济竞争者到结构性威胁者。初始阶段,中国被描绘为所谓“不公平贸易者”“工业间谍”“盗窃者”,即一种经济领域的威胁。这一阶段的叙事主要围绕“美国受害—中国受益”的零和结构展开,带有明显愤怒情绪。第二层是从结构性威胁者到制度挑战者。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威胁属性逐步转向制度与价值层面。他开始将中国政府描述为“不透明”“不守规则”“想改变国际秩序”,将经济议题扩展至制度竞争,情绪色彩从愤怒转为焦虑与不安。第三层是从制度挑战者到阴谋性他者。在疫情等事件的叠加下,特朗普对中国的情绪推断进入“阴谋化”阶段。例如,他声称“中国故意让美国变弱”“中国试图统治世界”,这些叙事不再是政策分歧的表达,而是一种“敌意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 of hostility)的情绪性建构。

这一三阶段演化过程展示了情绪如何在结构性竞争背景下不断升级,并最终将中国转化为一种具备全方位威胁属性的“情绪对象”(emotionalized object)。

3. 文化异质的“焦虑感”蔓延

特朗普对中国的敌意不仅源自经济与战略层面的竞争,更深层地说,是由文化与身份冲

突引发的情绪反应。在社会认同理论看来,对外群体的“陌生性”容易激发防御性情绪,尤其是在外群体呈现高速发展或制度成功时,会形成“身份威胁”(identity threat)。

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逻辑与国家治理模式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近年来在制度效能、科技发展及社会治理方面展示出的“非西方式成功”,对美国极右群体和保守派产生了强烈冲击。这种冲击被特朗普进一步情绪化处理,转化为一种“美国身份被动摇”的焦虑情绪。

在特朗普的政治语言中,排他性表达不仅是制度批评,更是对文化差异的情绪性否定。文化陌生感在其认知中被转化为威胁,这种再编码过程本质上是情绪化的,而非基于文化分析的实证判断。这种身份焦虑成为他对华强硬话语的主要动员资源,使中国成为“美国身份迷失”叙事中的情绪焦点。

4. 情绪动员的“凝聚感”塑造

特朗普两个任期,都遭逢美国社会内部政治分裂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制造业就业流失,中产阶级焦虑上升。面对这些无法通过短期政策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特朗普采取了某种“替代性敌意投射”策略,即通过构建外部敌人来统一内部情绪,将本应指向国内政治与经济结构的问题转向对外敌意。^[34]

这一策略有三种心理效果:第一,简化复杂性。中国成为解释美国社会危机的简化模板,使公众无需理解复杂的技术变迁、资本流动与产业链重构。第二,外化责任。公众的愤怒与不满得以外转,减少了对政府与精英集团的问责压力。第三,情绪凝聚。敌意叙事能够跨越党派裂痕,形成短期政治动员的“情绪共同体”。

因此,中国在特朗普叙事中不仅是外交议题,更是美国社会情绪的“容纳器”,这使得特朗普的对华敌意具有比传统共和党政府更强烈、更爆炸性的社会基础。

5. 敌意升腾的“愤怒感”定型

随着对华敌意的累积,中国在特朗普心理结构中的位置逐渐从“现实竞争者”滑向“意识形态敌人”。这一滑动带来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政策不再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基于情绪符号逻辑,关税、制裁、封锁成为“表达愤怒”的象征。第二,对华政策形成了一套“情绪意识形态”,其核心特征包括:将中国描绘为具有永久威胁性的敌人;将所有中国行为纳入“挑战美国”的本质性解释;将对抗中国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必要条件;将敌意政策常态化、道德化。情绪结构一旦意识形态化,就会形成高度稳定的政策路径依赖,使政策行为脱离理性考量,呈现极端化和不可逆化特征。

综上,特朗普对中国的情绪机制构成了其对华政策强烈敌意的深层动力。中国复兴所引发的失控感、文化差异引发的身份焦虑、美国国内困境、政治极化与替代性敌意投射共同作用,使中国在特朗普心理中经历了从“竞争者”到“失控的他者”的政治心理演化。最终形成的敌意图式具有高度情绪化、意识形态化和不可逆化特征,并直接塑造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强硬走向与整体对抗结构。这种情绪机制不仅解释了特朗普政策的激烈性,更揭示了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化”倾向,是理解中美关系近期结构性恶化的重要理论路径。

(三)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决策强化

特朗普对华认知和情绪之所以能够突破个人心理边界并演化为具有结构性、持续性与制

度化特征的国家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美国行政体系内部形成了一系列认知放大机制,使得原本带有明显个体偏见的情绪性判断在制度环境中获得合法化、扩散化与路径依赖化。换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是个人心理结构的外现,更是美国决策体系在其领导风格影响下发生“制度性扭曲”之后的产物,使得特朗普的对华敌意从心理层面的“偏差”转变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方向”。

1. 同质化的决策团队

特朗普两任政府在对华议题上的决策团队具有高度同质化特点,这是其对华政策不断极化的制度性起点,团队关键人物不仅在理念上高度一致,而且构成了白宫内部“对华强硬叙事”的核心生产者。他们的角色不仅是政策顾问,更是对特朗普情绪性认知的某种“叙事验证机制”。

当决策群体呈现四个特征时,集体盲点就容易产生,即领导人强烈的偏好与控制需求、团队成员结构同质化、异议机制缺失、信息输入渠道单一。^[35]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几乎完全符合上述条件。首先,特朗普对团队成员的任用标准并非专业性,而是“个人忠诚度”与“叙事一致性”,这导致国家安全团队呈现高度的“意识形态趋同”。其次,在对华政策机制中,国务院、情报机构等传统制衡力量被边缘化,而白宫内部小圈子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在其两届任期内经历多次领导更迭,制度连续性被削弱,削弱了原本用于吸收复杂信息、平衡政策方向的官僚机制。

在这种环境中,特朗普的初始敌意判断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被不断重复与强化,使其敌意认知成功完成从“个体偏差”到“集体意见”的转化。鲁比奥与纳瓦罗等人不断提供选择性信息,加强“中国威胁论”,使特朗普的偏差性信念得以巩固并形成政策正当性。这一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组织情绪共振效应”,即领导人情绪与团队成员理论框架之间产生共振,使得政策方向以情绪为核心动力而非基于事实的分析。^[36]

2. 情绪化的决策方式

特朗普的决策方式具有与传统美国总统显著不同的特征,即“即时化”和“非正式化”。这一决策风格使情绪反应能够直接进入政策场域,弱化了行政体系的专业过滤机制。

首先,特朗普广泛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政策表达与施压工具,直接绕过官僚机构的程序性审议,使政策信号高度个体化和即时化。在传统政策制定过程中,外交或安全政策往往需要专业论证、跨部门协调、风险评估等多环节过滤。然而特朗普通过推特进行“政策发布”,使其情绪性表达成为政策语言的一部分。

在国际政治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政策化”,即情绪不再是政策的背景变量,而是政策选择的直接动因。^[37]例如,在贸易谈判中,特朗普往往因为对中国官员的表述或谈判节奏的不满而突然调整政策立场,使对华政策呈现高度波动与不确定性。这种“情绪即政策”的逻辑明显不同于传统美国政府的“策略化—制度化”逻辑。

其次,特朗普的情绪不稳定性与其管理风格的“混乱化”相叠加,使得白宫内部缺乏稳定的信息流动机制。在特朗普政府内,传统的政策备忘录、书面意见与正式会议机制被压缩,非正式交谈、私人建议与媒体影响成为主要的信息输入方式。^[38]这进一步削弱了决策过滤机制,

使任何能够触动特朗普情绪的因素都可能对政策产生即时影响。

3. 回音室化的信息环境

特朗普的信息来源呈现显著的“认知回音室”(cognitive echo chamber)特征,其信息吸收渠道高度集中在少数保守媒体、意识形态强硬的智库以及小范围的私人顾问网络中。^[39]这种结构导致其接触到的信息呈现高度选择性与偏见性。

保守媒体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与部分右翼网站长期以情绪化、危机化、敌意化叙事报道中国,使中国在美国公众舆论中的形象不断向负面极端滑移。这些媒体报道往往缺乏深度,以简单化的二元逻辑呈现中美关系,与特朗普自身的认知结构高度契合,从而形成“认知与情绪的双向验证机制”。媒体强化“威胁叙事”,特朗普通过政策回应媒体叙事,而媒体再将政策描绘为对威胁的合理反制,形成危险的反馈循环。

同时,特朗普高度依赖少数亲信顾问,其中一些甚至不具备外交或经济专业背景。他们向特朗普提供的信息往往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强调中国“制度性威胁”,而缺乏结构性分析。由于特朗普对专业官僚体系高度不信任,他更倾向采纳这些私人意见,使其认知回音室的封闭性进一步增强。

这一机制不仅强化了特朗普的认知偏差,也推动美国公众舆论走向极化,使“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社会中成为跨党派共识,从而为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更稳固的制度性基础。

4. 制度化的政策工具

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多项对华政策措施不仅具有即时性与象征性,更在制度层面造成深刻的“结构嵌入”,使得对华敌意不再是个人偏好,而成为美国国家战略体系内部的路径依赖。

从政策类别看,特朗普两任政府形成了两条制度化对华工具链:

第一,贸易战制度化。301 调查的启动及关税大规模实施,使“惩罚性关税”成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常态工具,而不仅是临时性手段。其法律基础并未随特朗普首次卸任而消失,为拜登继续使用提供了制度空间,并随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得到加强。

第二,科技战制度化。通过将华为、中兴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以及推动 TikTok 在美业务强制剥离,美国对华技术限制从孤立案例演变为体系化安排,涉及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安全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横跨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的“技术安全治理框架”。同时,投资审查得到的强化与扩围,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权力大幅扩张,形成对中国投资的结构性限制。

这些措施共同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度性“硬化”。即便特朗普首次离任期间,这些制度安排仍继续构成美国战略政策的基础,形成强烈的不可逆性。最终使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高度强硬、持续性和难以逆转的结构性特征,为中美关系进入“全面结构性竞争时代”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剧烈转向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个由个体心理特质、情绪加工机制与行政决策体系共同作用所推动的复杂生成过程。“认知—情绪—决策”链条不仅解释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发性、极化性和情绪化特征,更揭示了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从竞争走向对抗的深层心理与制度逻辑,从而为理解中美关系未来的结构性紧张提供了必要的分析基础。

三、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心理实践案例分析

在特朗普两个任期内,中美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政策实践领域,是以关税为主要工具的“贸易战”和以技术封锁为主要形式的“科技战”。二者一方面分别承载了经济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焦虑,另一方面在心理层面则分别对应特朗普对“过去损失”的愤怒性反应与对“未来威胁”的恐惧性投射。因此,要完整把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心理逻辑,仅停留在抽象层面的“认知—情绪—决策”链条尚不够,有必要将这一分析框架嵌入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之中,分析特朗普对华心理图式如何在具体议题中被激活、放大并最终制度化。

(一)贸易战:对“过去损失”的愤怒

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诸多领域中,贸易战无疑是最早呈现出高烈度对抗特征,也是最为公众熟悉的一个议题。表面上看,2018年以来的关税加征是美国针对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的一揽子政策组合;但从国际政治心理学视角观察,贸易战也是特朗普“损失图式”在对华关系上的一次集中爆发,是其以经济民族主义修辞回应国内结构性焦虑的象征性政治行为。

1. 贸易战的认知起源

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心理逻辑中,最深层的根基来自其对外部世界的主观认知框架,这种认知结构构成了政策的前提条件,使得贸易战在其执政早期便迅速升级并成为对华政策的“首要战场”。

首先,贸易战的启动深深植根于特朗普对“损失”的主观感受,而非仅仅基于对经济结构的客观评估。个体对同等规模的损失所产生的痛感要显著高于对同等规模收益的满足感,^[40]特朗普在其长期的商业与政治实践中,一贯强调“不能输”“不能被人占便宜”,这一价值取向与损失厌恶的心理机制高度契合。中美贸易逆差在他的认知中被不断强化为“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这种思维事实上是对复杂贸易结构的情绪化简化,在其认知里,贸易逆差不是经济结构性分工的结果,而是“美国被掠夺”的直接证据。

其次,零和思维为这一损失叙事提供了坚固的认知框架。特朗普习惯将国际经贸关系理解为类似房地产买卖的谈判场域,将他国的收益直接视为本国的损失。在这种零和模式中,国际经贸秩序中“互利共赢”的可能性被大幅压缩,合作被理解为“暂时妥协”,规则被理解为“有人在占更大的便宜”。因此,当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提升时,在特朗普的心理图式中便被自然地视为美国在这一体系中“正在不断失利”的反向镜像。

再次,防御性归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扭曲的认知模型。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客观结构来看,美国国内制造业衰退、产业外迁、就业市场重构,与技术进步、资本逐利、企业全球布局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41]然而,特朗普极少在公开论述中涉及这些复杂因素,而是通过简化叙事将问题归结为“中国利用了我们的开放市场”“过去的美国领导人签了糟糕的协议”。在这一防御性归因模式下,中国不仅是“贸易逆差”的统计对象,更被塑造为美国结构性经济困境的“人格化责任主体”。

可以说,损失厌恶的人格特质、零和思维与防御性归因三者的叠加,使特朗普在认知上预

设了一个高度敌意的贸易图式,即美国是“受害者”,中国是“加害者”;美国的逆差是被“欺骗”的结果,中国的顺差是“不公平竞争”的产物。贸易战的政策逻辑,正是从这样一个先在图式中推演而来。

2. 贸易战的情绪驱动

在上述认知框架基础上,特朗普将这种“损失图式”进一步情绪化处理,通过情绪动员机制将个人的损失感转化为广泛的社会情绪,将本来复杂的经济结构问题塑造为一个可以通过惩罚他者来解决的“情绪出口”。

一方面,美国中西部和部分传统工业州的白人工薪阶层长期承受产业空心化的冲击,他们在经济上感受到被边缘化,在政治上感受到被忽视,在文化上感受到地位下降。^[42]这种多重压力形成了一种弥散性的结构性失控感,但在没有明确对象之前,这种失控感焦虑往往处于无指向状态。特朗普通过将贸易逆差形象化为“工厂关门”“工作外流”,再通过“中国夺走了我们的工作”“中国吸走我们的财富”等叙事,将这种无指向焦虑成功引向“对外者的怨恨”。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定向过程”,即领导人通过构建特定因果叙事,使原本抽象的结构性不满转化为对具体他国的敌意。^[43]另一方面,特朗普通过重构“公平”概念,为贸易战赋予了道德情绪的正当性。在多边贸易体制话语中,公平通常指程序公平与规则公平,即在共同约定的规则下进行博弈。然而在特朗普的修辞中,“公平贸易”被重新定义为“美国不能吃亏的贸易”。这种以本国损益为唯一标尺的情绪化“公平观”,为关税战提供了高度简洁的价值依据:只要美国“亏了”,就可以通过惩罚对手来恢复公平。这种“公平重构”在心理层面极大地激活了“受害者愤怒”,使惩罚行为不再被视为可能的非理性行为,而被视为维护所谓“正义”的自然选择。

此外,怨恨情绪在特朗普的政策语言中频繁出现,使贸易问题被情绪化编码。他反复使用“耻辱”“被利用”“被愚弄”等措辞,将经济指标转化为情绪体验,这种情绪话语进一步压缩了理性讨论空间,使技术性政策争议沦为情绪对抗的附属物。

3. 贸易战的决策强化

当认知偏差被情绪放大后,其政策影响最终通过具体的决策过程被制度化与行为化。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与行政体系的变形共同推动贸易战走向非传统轨道,使这种被情绪强化的认知偏差得以直接、快速,并几乎无过滤地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动作,从而导致贸易战呈现出非传统、不可预测且高度个人化的决策轨迹。其一,极限施压是特朗普从商业领域带入政治领域的重要行为模式。他坚信高压手段是迫使对手妥协的最佳方式,因而在贸易战中不断通过升级关税、威胁更大规模制裁等方式累积压力。其背后逻辑并非对成本一效益的综合衡量,而是源自“逼到对方崩溃,对方就会让步”的直觉判断。^[44]这种“交易性极限施压”在企业谈判中尚有一定适用性,但投射到国家间关系中,则极易触发对方的反制与升级,形成双输局面。其二,特朗普的情绪化决策风格与推特治国方式,使贸易战的策略调整呈现出明显的即时性与波动性。多次中美谈判期间,他在推特上发布截然相反的表态,一方面称“谈判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背弃承诺”“必须付出代价”。这种前后矛盾的信号不仅削弱了美国谈判立场的一致性,也反映出其决策过程高度依赖当下情绪状态,而缺乏系统性预案。其三,传统官僚体系的制衡功能在贸易战决策中被显著削弱。按照常规,美国对外经贸政策

应在财政部、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协调下形成,理论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领导人个人情绪的冲击。然而特朗普政府决策重心高度集中于白宫核心圈子之中,专业部门在许多关键环节被排除在外,使得专业意见难以形成有效约束。这种“去官僚化”的决策模式,使个人偏见更容易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并非静态政策,而是在其两个任期之间呈现出由认知偏好、情绪机制、团队重组与现实变化共同塑造的动态演化轨迹,从以愤怒驱动的象征性关税冲突,走向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体系化竞争框架,其心理逻辑虽保持连续性,但政策形态却随政治结构与国际环境的变动而持续重塑。首先,特朗普“报复”的核心认知图式始终保持稳定,但其外显方式随着政治议程变化而发生迁移,第一任期侧重以关税作为象征性惩罚工具,第二任期则将贸易认知直接嵌入更宏大的国家安全叙事,在最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打击不公平贸易”设置为核心战场。其次,其情绪动员方式亦出现阶段性调整,从最初以愤怒驱动选民对外指向的“即时政治收益”,逐渐转向在控制西半球和门罗主义基调上维持长期对华警觉情绪、塑造稳定的政治身份边界,情绪从“爆发式动员”转向“结构性维持”。再次,其核心决策团队在两个任期中的重组加速推动贸易战走向制度化。第一任期中,白宫内部鹰派人物主导强硬取向,而专业官僚被边缘化,进入第二任期后,贸易议题被更紧密地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技术、产业政策团队,形成“经贸—科技—安全”一体化的政策链条,使对华贸易战从单点施压转为整体战略。最后,国际现实的深刻变化亦不断反向塑造政策路径,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国内对华共识的强化、盟友态度的调整,都使特朗普的贸易战从最初的个人风格化举措逐渐演化为当下美国对华竞争的结构性组成部分。

(二)科技战:对“未来威胁”的恐惧

与贸易战相比,科技战在动因上更具前瞻性,在逻辑上更具结构性,在执行上也更具不可逆性。若说贸易战主要围绕“美国已经遭受的损失”展开,那么科技战则主要围绕“美国未来可能失去的优势”展开。前者是一种回顾性的损失叙事,后者是一种预测性的威胁叙事。这一差异决定了科技战在特朗普心理世界中所承载的情绪对象更为深刻,所激发的防御性反应也更为剧烈。

1. 科技战的认知起源

认知结构不仅决定特朗普如何解释中国的技术进步,更决定其如何想象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换言之,科技战的情绪和行动之所以得以形成,首先来自一个科技上可能“美国不再伟大”的威胁认知框架。

首先,科技战的启动深深植根于特朗普对中国科技崛起的封闭性认知。在这一认知下,中国的科技发展并未被理解为一国现代化进程的正常表现,而是被重新编码为“重塑全球信息与安全秩序的前奏”。这种“未来威胁投射”将技术发展从经济竞争领域迁移至国家安全框架,使原本中性的技术进步被赋予强烈的战略意涵。换言之,中国技术能力的提升在特朗普的认知中,被视为美国全球主导权可能受到侵蚀的前兆,而不是全球技术合作或分工演进的自然结果。

其次,技术优势丧失的图式性依赖为上述威胁投射提供了稳定的认知支架。美国长期以

来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创新中心,其霸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优势的持续保持。^[45]当中国在关键前沿技术领域缩小差距时,特朗普容易将此视为美国技术主导权的潜在丧失,并进一步上升为“国家安全受到根本性冲击”的图式。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科技企业被视为国家战略工具,其全球扩张被理解为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的“前沿布局”,而非企业自主行为或全球产业链竞争的自然延伸。

再次,防御性归因进一步固化了这一敌意情绪。在特朗普的认知中,科技竞争从经济领域被“生存化”(existentialized),即不再被视为市场份额和企业竞争的问题,而是事关美国未来国家地位、制度存续与文明竞争的根本性问题。这种生存化思维极大压缩了合作与妥协空间,使技术议题天然趋向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2. 科技战的情绪驱动

在这样的威胁认知基础之上,科技议题被情绪化地重新编码,使其从结构性竞争转化为深层次的心理危机。认知偏差在此阶段被情绪进一步放大。在情绪层面,科技战体现出与贸易战不同的情绪构成。若说贸易战以愤怒和怨恨为主导情绪,那么科技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与身份焦虑驱动。科技战得以全面升级,正是因为情绪成为将威胁认知转化为政策动能的关键中介。

首先,未来威胁投射直接激发恐惧情绪。特朗普及其顾问不断强调“中国将主导5G”“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会改变战争形态”,这种叙事营造出一种“美国正在被未来抛弃”的心理图景。恐惧作为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往往促使决策者倾向于采取预防性甚至过度防御性的政策,哪怕相关威胁尚未成熟。^[45]

其次,技术优势在美国国家身份中的核心地位,使得技术竞争激活了更深层次的身份危机焦虑。在特朗普的叙事中,美国之所以伟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引领世界科技”,一旦这种优势被认为正在被中国“侵蚀”或“替代”,国家身份的稳定性便会受到挑战。这种身份焦虑与其选民基础中盛行的“美国衰落论”相呼应,为科技战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情绪资源。

再次,技术民族主义为上述情绪提供了一种政治表达形式。在这一立场下,科技被理解为国家力量的核心资产,关键技术与基础设施必须掌握在“值得信任的国家手中”。中国在此框架中被归类为“制度不可信赖的他者”,其技术产品被情绪化编码为潜在所谓“控制工具”和“监视工具”,技术民族主义由此将恐惧与焦虑整合为一种具有明确政策指向的政治情绪。^[46]

3. 科技战的决策强化

当未来威胁的认知被恐惧、焦虑和技术民族主义强化之后,这些心理机制最终在特朗普独特的决策结构中被转译为制度化政策行动,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周期框架。科技战的启动与升级是特朗普两任政府对华政策中最具结构性与长期性的部分,个体认知偏差被制度环境吸收、放大并最终固化为国家政策逻辑,从而强化科技竞争的持久性与破坏性特征。

一方面,特朗普个人情绪被执政团队即时贯彻为政府意志。与传统美国总统依赖专业官僚体系进行政策过滤不同,特朗普的科技战政策表达呈现出明显的即时化、情绪化与个人化特征。他的愤怒、焦虑并不完全经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或商务部的程序性审议,而是通过推特、行政命令以及非正式会议被直接转译为政策行动,其执政团队风格也注重对特朗普

的“效忠”。特朗普个人心理在这一机制中不再是政策形成的背景变量,而成为科技战政策推进的直接驱动力,使对华科技政策呈现出高度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认知回音室结构强化了威胁叙事并推动科技战制度化。特朗普的信息渠道长期呈现高度封闭化特点,其政策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亲信顾问、意识形态化智库以及右翼媒体。在这一回音室结构中,中国科技发展被单向度地描述为对美国制度安全、信息控制权与未来霸权地位的“生存性威胁”。媒体的危机化叙事、顾问的意识形态化解释与特朗普自身的竞争焦虑相互强化,使科技议题被话语化和意识形态化地从经济问题转化为制度之争与价值之争。这一机制使得科技战不再仅是权宜性的战略选择,而被塑造为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必然选项”。

与贸易战类似,特朗普的科技战同样不是静态政策,从最初的防御措施,发展为近乎不可逆转的体系性技术竞争框架。首先,在认知层面,特朗普关于“中国技术威胁”的图式在第二任期中进一步强化并结构化,若第一任期仍以阻止特定企业扩张为主要目标,那么进入第二任期后,这一图式被扩展为“美国优势正遭受全面侵蚀”的整体框架,使科技竞争从分散议题升格为战略总纲的重要部分,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成为与军事、外交、经济同等的重要维度。其次,在情绪层面,随着近年AI等新兴技术的爆发,科技战逐渐从前期以恐惧和焦虑为主导的情绪反应,演化为一种更加稳定、制度化的长期戒惧心态,恐惧不再只指向单一技术突破,而是指向科技能力的系统性担忧,这种情绪既强化了科技战的持续性,也降低了政策回调的政治空间。再次,核心决策团队的更迭与权力集中进一步推动科技战的制度化,第一任期中,科技战工具主要由少数强硬顾问推动,而进入第二任期后,美国国内的科技右翼开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商务部的产业与安全团队形成了更紧密的政策联盟,深度参与美国政治,使科技战从个别政策倡议转变为跨部门、多工具联动的整体战略结构。换言之,科技战的决策已经从依赖领导人个人冲动,转向由制度设计、安全官僚体系和科技右翼共同维护的政策路径依赖。最后,国际结构现实的快速变化也为科技战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全球技术体系的碎片化、供应链区域化趋势、跨国科技企业政治化,以及美国国内科技界、国会与智库对中国科技威胁的共识化,使得科技战逐渐脱离个人政治的范畴,成为美国战略竞争结构变迁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现实牵引下,特朗普科技战的原始情绪冲动被不断吸收进制度设计之中,使科技脱钩、技术管制、供应链重塑等政策不仅具有工具性目标,更具有身份性与结构性意义。

贸易战与科技战虽然分别对应不同的政策领域和行为逻辑,但在心理结构与政策机制层面却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演化方向。通过贸易战与科技战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生成并非传统意义上仅仅基于宏观结构评估、利益算计或制度路径的理性决策,而是由一套深层心理链条所主导,并在行政体系的组织偏差中得以制度化,本文“认知—情绪—决策”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分析链条具备解释力,贸易战与科技战分别以“过去损失”与“未来威胁”作为心理刺激源,从不同方向推动这一链条闭合并固化。

四、结语

变局时代的中美关系之变,固然包括实力分布的变化和利益结构的重组,但也存在认知

结构的演变。本文以“以心观政”为题,旨在突破传统“以势观政”“以利观政”的单一路径,将分析焦点前置到国家行为背后领导人的认知图式、情绪机制与心理逻辑。特朗普两任政府时期对华政策的突变,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修昔底德陷阱”或抽象的“中美大国博弈”,也无法完全用制度、联盟、选举政治等传统变量予以说明。本文从领导人心理的问题意识出发,尝试将分析重心由宏观结构下沉至领导人个体的心理结构与认知机制,由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由“认知—情绪—决策”构成的领导人外交心理链条模型,从而弥补了现有中美关系研究在微观心理机制方面的系统性不足。首先,在认知层面,领导人的自恋性人格、零和式交易思维、高度认知封闭等特质决定了其如何“看见中国”,即如何通过既有图式理解中国行为;其次,在情绪层面,失控感、威胁感、焦虑感等情绪变量决定了领导人如何“解释中国”,即如何将外部信息情绪化编码并赋予敌意涵义;最后,在决策层面,美国行政体系中的回音室效应、决策团队同质化以及政策工具的制度化扩散机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认知偏差与情绪影响,决定了领导人最终如何“处理中国”。该链条不仅打通了认知偏差、情绪激活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因果路径,也首次将领导人心理变量明确置于自变量、中介机制与政策结果之间的分析位置,从而为解释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突变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国际政治心理学分析框架,突破了以往中美关系研究中过度依赖“结构必然论”的解释范式。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对华政策取向既不是结构必然,也不是完全偶发,而是结构压力、心理机制、制度运行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一方面,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化红利的再分配与美国内部社会撕裂,为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结构性土壤;另一方面,特朗普个人的心理结构及其对中国复兴的情绪化解读,极大地强化了威胁感知与敌意叙事;再加之美国行政与舆论系统的组织性偏差,使原本具有高度个人色彩的认知偏差得以被制度化、常态化,最终锁定为贸易、科技乃至价值观层面的激烈对抗。贸易战与科技战两个案例表明,特朗普治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转折点,不在于某一具体事件本身,而在于特朗普如何在“过去损失”的情绪框架与“未来威胁”的心理投射中建构对华认知,并通过行政权力将这种情绪化思维嵌入国家战略之中。此外,本文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个颇为危险的趋势,即当大国竞争被领导人主观上“生存化”“文明化”“宿命化”之后,政策空间将不可避免地从事可管理的竞争滑向不可控的对抗。一旦这种带有强烈心理色彩的敌意叙事被制度化和话语化,它就不再依赖于某一位领导人的在任与否,可能会以“新共识”“新范式”的形式在国家战略共同体内部长期存在,从领导人心理上升为国家心理,从而显著降低未来美国对华政策止损和纠偏的可能性。正确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理解特朗普对华政策,不只是学理上的解释需求,更具有现实的稳定性价值。

国际政治,并非总是冷静算计的博弈过程,也是一部充满投射、焦虑与误解的心理剧;而领导人,则是这部心理剧中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理解特朗普对华认知的情绪轨迹,是洞察当代美国政治心理裂隙的重要入口;把握这一心理机制如何被转译为国家政策,是研判中美未来如何走向理性竞争、有效管控危机乃至重建合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5 [R/OL].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025-12-05.

- [2] Joshua D. Kertzer and Dustin Tingley.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2018, pp.319-339.
- [3] Margaret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4, No.1, 1980, pp.7-46.
- [4]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5]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1.
- [6]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1, No.1, 1997, pp.87-112.
- [7] 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p.190-222.
- [8]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9] 黄钊龙, 韩召颖. 美国战略界关于对华战略的争论 [J]. 东北亚论坛, 2023(4): 34-49.
- [10]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1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 [12] 韦宗友. 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J]. 国际观察, 2022(3): 70-96.
- [13] 王浩.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3): 47-69.
- [1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How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4, 2013, pp.7-48.
- [15]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The Pessimist N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6] 王联合, 孟晓宇. 战略叙事的双重竞争: 美国对华政策极端化的生成逻辑 [J]. 国际展望, 2025, 17(3): 113-135.
- [17] 严谨, 邵静怡. 美国精英对中拉关系的认知及其影响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5(4): 87-102.
- [18] Rose McDermott.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5, No.4, 2013, pp.367-380.
- [19] 王一鸣, 时殷弘.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1): 98-127.
- [20] 季乃礼, 孙佳琪. 特朗普对华心理探析——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 [J]. 理论与改革, 2019(3): 79-94.
- [21] 刘璐.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特朗普个人认知因素 [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19(11): 62-71.
- [22] 尹继武. 无序中的理性逻辑: 特朗普的战略心理与行为偏好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5(5): 53-77.
- [23]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U.S. Views of China Turn Sharply Negative amid Trade Tensions [R/OL].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13,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9/08/13/u-s-views-of-china-turn-sharply-negative-amid-trade-tensions/>, 2025-11-27.
- [24] Ole R. Holsti.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y [M]. In John C. Farrell and Asa P. Smith eds. Image and Real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6-39.

- [25] 庞金友. 特朗普 2.0 时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可能趋势[J]. 国外理论动态, 2025(3): 100-113.
- [26] Gordon D. Atlas and Melissa A. Them. Narcissism and Sensitivity to Criticism: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J]. *Current Psychology*, Vol.27, No.1, 2008, pp.62-76.
- [27] Tanja S. Stucke. Who's to Blame? Narcissism and Self-Serving Attributions Following Feedback[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17, No.6, 2003, pp.465-478.
- [28] 庞金友, 赵浩然. 建构的“我们”与想象的“敌人”: 当代美国政治叙事中的阴谋论[J]. 太平洋学报, 2025(7): 17-30.
- [29] Fiona B. Adamson and Kelly M. Greenhill. Deal-Making, Diplomacy and Transactional Forced 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9, No.2, 2023, pp.707-725.
- [30] Donna M. Webster and Arie W. Kruglanski.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67, No.6, 1994, pp.1049-1062.
- [31] Stephen Benedict Dyson. Leader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M]. In Juliet Kaarbo and Cameron G. Thie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359-376.
- [32] Caleb Pomeroy. The Damocles Delusion: The Sense of Power Inflates Threat Perception in World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9, No.1, 2025, pp.1-35.
- [3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4] Harold D. Lasswell.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 [35] Irving L. Janis. *Victims of Groupthink: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 [36] Sigal G. Barsade. The Ripple Effect: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Group Behavio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7, No.4, 2002, pp.644-675.
- [37] Robin Markwica. *Emotional Choices: How the Logic of Affect Shapes Coercive Diplomac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38] Peter Baker and Susan Glasser. *The Divide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2017-2021*[M]. New York: Doubleday, 2022.
- [39] 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J]. *Political Behavior*, Vol.32, No.2, 2010, pp.303-330.
- [40] Barbara A. Meller, Siyuan Yin and Jonathan Z. Berman. Reconciling Loss Aversion and Gain Seeking in Judged Emotion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30, No.1, 2021, pp.95-102.
- [41] 丁纯, 陈腾瀚. 中美欧制造业竞争: 现状、政策应对与前景[J]. 欧洲研究, 2021(5): 6-35.
- [42] 林玲, 李常荣. 特朗普的强势回归与美国右翼民粹政治的主流化[J]. 和平与发展, 2024(6): 127-149.
- [43] Jennifer S. Lerner and Dacher Keltner. Fear, Anger, and Ris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1, No.1, 2001, pp.146-159.
- [44] Donald J. Trump and Tony Schwartz. *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45]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1, 2005, pp.77-106.
- [46] David C. Kang, Adam Segal. The Siren Song of Technonationalism[J].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9, No.2, 2006, pp.5-11.

[责任编辑 许佳]

Politics through the Mind :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Analysis of Trump's China Policy

CAI Cui-hong YU Da-hao · 64 ·

Abstract : U.S. policy toward China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splayed pronounced features of irrationality and abrupt shifts.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gnition-emotion-decision" chain model to explain how leader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shape policy formation. Trump's policy preferences toward China stemmed from his distinctive cognitive structure.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ccumulated, existing cognitive biases were further amplified by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reinforced through execu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se dynamics ultimately manifested in high-intensity and high-risk policies, including the trade war and the technology war with China. The proposed chain model suggests that the radicalization of U.S.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Trump era cannot be explained solely by structural competition, but also resulted from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leadership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the trajectory of Trump's perceptions and emotions regarding China provides an important lens for examining the psychological cleavages in contemporary U.S. politics. More importantly, identifying how thes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re translated into state policy is crucial for assessing whether China-U.S. relations can move toward more rational competition,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and renewed cooperation.

Key Words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sychology ; Trump's China Policy ; Psychological Chain of Policymaking ; Trade War ; Technology War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 Chain Security Narrative toward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SU Hang SUN Ai-hua · 82 ·

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ha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supply chains. Leveraging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narrativ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S.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its supply chain security narrative toward China under the "generation-application" framework. By employing a "binary opposition" security narrative, the U.S. has fostered exclusive group identity, portraying China as a "risk" and "threat"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rise of this narrative represents not only a superficial response by the U.S. to global supply chain risks but also a strategic tool to solidify perceptions of China-related supply chain risks and establish discursive hegemony over supply chains. In essence, it leverages security narratives to expand U.S. policy options toward China and maintain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Building on this narrative found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dvanced supply chain initiatives such as "de-risking" and "de-Sinicization", translating security narratives into concrete policy practices and generating a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narrative formation and policy feedback. The U.S. supply chain security narrative toward China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operational dynamic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system. Supply chain security narratives have emerged as a new issue in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a new driver of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ctively construct a narrative framework conducive to its own interests and stable global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counter narrative, proactive narrative, and global governance narrative", thus continuously enhancing China's discursive power in shaping global narratives.

Key Words : Supply Chain Security Narrative ; Generation-Application ; Role Construction ; Binary Opposition ; Action Framework ; Discursive Power

Pragmatic Diplomacy of the Lee Jae-myung Administr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Its Policy toward Japan

ZHAN De-bin · 96 ·

Abstract : This paper takes the theory of pragmatic diplomacy as its analyt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rest prioritization-issue differentiation-flexible balancing"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adjustment logic, practical pathway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Lee Jae-myung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Japan since it assumed off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e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continued its distinct anti-Japanese political stance from its time in opposition. Instead,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role transformation to head of state, shifts in domestic public perception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t has adopted a pragmatic diplomatic approach toward Japan oriented toward policy outcome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re features of this approach are reflected in several dimensions. First, in setting diplomatic priorities toward Japan, it emphasizes policy continuity while downplaying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Second, regarding historical issues, it acknowledges existing policy arrangements, adheres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avoids escalation of confrontation. Third, it strengthens leader-leve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huttle diplomacy". Fourth, it promotes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South Korea-Japan relations through multi-track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lthough this pragmatic approach has, to some extent, mitigated policy fluctuations resulting from regime change, it has not altered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acing South Korea-Japan relations. Historical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resurgence of right-wing politics in Japan, and the alliance-oriented consolidation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collectively compressed the policy space for pragmatic diplomacy. As a result, South Korea-Japan relations exhibit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stability with underlying fragility". The diplomatic practice of the Lee Jae-myung administration demonstrates that pragmatism is not a final solution to bilateral tensions, but rather a realistic strategy for managing risks, mitigating conflicts, and secur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und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Key Words : Lee Jae-myung Administration ; Pragmatic Diplomacy ; South Korea-Japan Relations ; Policy toward Japan ; Shuttle Diplomacy ; Multi-track Coopera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 Degeneration : An Analysis Based on U.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Policies

LIU Bin LI Sheng-miao · 111 ·

Abstract :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order is entering a period of restructuring under the impact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Norm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have also been disrupted and reshaped. Existing norm theories overlook the complex process of norm degeneration caused by the policy changes of leading countr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norm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By examining changes in U.S. policies in areas such as trade and economic affairs, climate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this article shows how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s have shifte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norms. The study further refines the process of normative change un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inforcement of neoliberal norms to "lock in" China, to the Trump 1.0 administration's turn toward partial abandonment, then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emphasis on the values underlying norms and the resulting weaponization of norms, and finally to the Trump 2.0 administration's complete abandonment of neoliberal norm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s thus shifting from neoliberalism towar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order, China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norms, emphasize their functional role, address existing deficiencies, reduce their ideological overtones, and enhance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thereby providing greater certainty for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 Norm Degeneration ; Weaponization of Norms ; Neoliberalism ; Economic Nationalism